

19.05

唐绍仪研究论文集

珠海市政协
暨南大学历史系 编

89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唐绍仪研究论文集

珠海市政协
暨南大学历史系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唐绍仪研究论文集

珠海市政协编
暨南大学历史系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06印张23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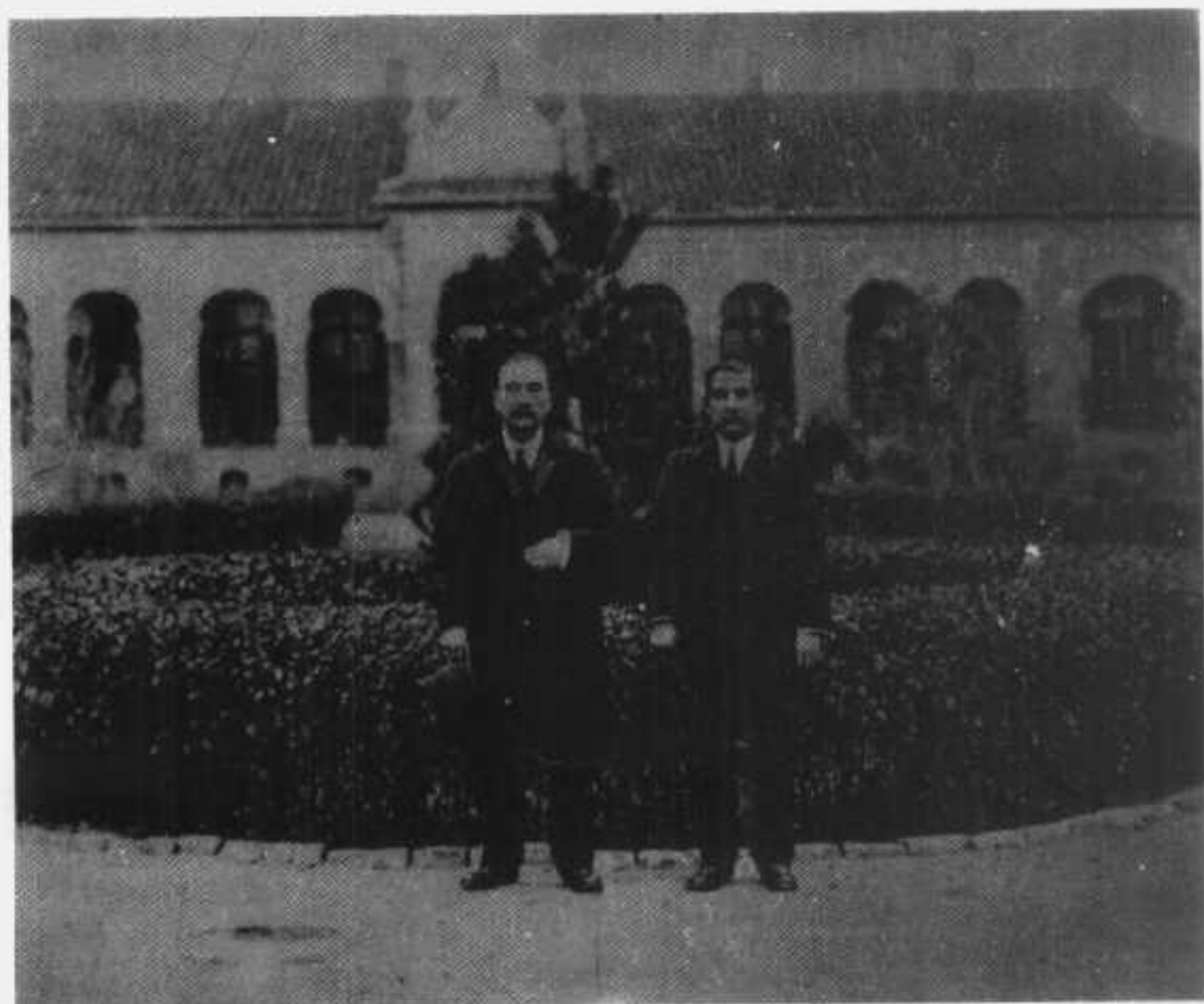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0452-0/k·105



唐绍仪



唐绍仪与孙中山



唐绍仪与部分阁僚合影

左起前排：教育总长蔡元培、工商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刘冠雄、暂署外交总长胡惟德、内阁总理唐绍仪；后排：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次长范沅濂、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王宠惠、秘书长魏宸组。

目 录

略论唐绍仪的政治生涯·····	余炎光	(1)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焦静宜	(29)
清末外交新秀唐绍仪的崛起·····	苏 苑	(41)
1901到1904年的天津海关道——唐绍仪·····	姚洪卓	(59)
唐绍仪1908年的日美之行·····	李 晶	(70)
唐绍仪出使欧日八国考察财政述谈·····	李国荣	(87)
从《莫理循书信集》看有关唐绍仪的几个问题 ·····	程为坤	(98)
论辛亥南北议和与唐绍仪·····	丁贤俊 陈 铮	(119)
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	朱 英	(133)
试论唐绍仪内阁的组成·····	胡绳武	(149)
唐绍仪与袁世凯·····	骆宝善	(174)
孙中山与唐绍仪·····	陈正卿	(191)
试论唐绍仪与孙中山·····	夏琢琮	(221)
关于唐绍仪在民国时期的几个问题·····	郑则民	(237)
唐绍仪与民国前期党派·····	周孝中	(255)
乱世中的“调和立国”者 ——论护法运动时期的唐绍仪·····	莫世祥	(269)
唐绍仪与中山“模范县”·····	沈锦锋 唐仕进	(288)
抗战初期的形势与唐绍仪·····	张晓辉	(309)
唐绍仪死因及晚节问题再探·····	夏茂粹	(327)
附录：唐绍仪的家世资料 ·····	梁超润 唐仕进	(340)
后记·····		(349)

略论唐绍仪的政治生涯

余炎光

唐绍仪（1862—1938）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他的起落沉浮，进取消极，经历过近代人物少有的迂回道路。要全面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不是三两篇文章就能定论的研究课题。这篇短文，仅就他在几个时期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提出一些粗浅的概括的看法。

一、维护民族利益的皇朝大吏

唐绍仪的政治生涯，是从担任清王朝的候选从九品小吏正式开始的^①。他一生中大半的政治活动，是在为封建皇朝服务中度过。经过近30年的努力奋斗，使他由一个品位低微的幕僚，逐渐递升至朝廷一品大臣。这决不是封建皇朝的恩赐，也不是唐绍仪个人特别走运所能给予，更不能说是依靠袁世凯锐意提拔的结果。

唐绍仪踏上政坛的日子，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

^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32—2033页，台湾1973年版。

年代，而国力衰弱的大清帝国，面对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步步紧迫的侵略，对外交涉便成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途径。唐绍仪开始从政，即进入这样的涉外部门，这不纯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更重要的是少年留学美国给他创造了具有从事涉外工作的良好条件。在朝鲜的16年，唐绍仪似乎是在寂寂无闻中虚度时光，但这段经历实际上已为唐绍仪积累了丰富的涉外工作经验，培养了坚实的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意识，又同袁世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都为唐绍仪后来的迅速成长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清王朝进一步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挽救国家危亡，维护民族权益，成了所有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改革朝政或推翻清廷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在朝的各级官吏，对此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也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几乎是与此同时，唐绍仪开始担负了独当一面的涉外工作——津海关道，历史为唐绍仪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绝好的机缘。自这时开始到辛亥武昌起义时止的近10年中，无论在津海关道任上，或以后的西藏议约全权大臣、外务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赴美专使大臣、邮传部尚书等岗位上，他都能坚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为维护民族权益作了出色的贡献。

列举唐绍仪从事的涉外工作并逐项加以评论，不是本文所能完成任务，纵观唐绍仪近十年中的涉外工作进程，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特点。

第一、在敌强我弱，朝廷又倾向于采取妥协求和、屈膝媚外的外交政策的情况下，唐绍仪通过谈判，力保中外相安，但又不再丧失国家权益或少损失国家权益。

1904年的中英西藏问题谈判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早在1903年英军侵入西藏以后，即胁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拉萨条约”^①。按照这个条约，英国实际上已将西藏置于其势力的保护之下。而列强则以英国取得西藏为由，纷纷意欲在中国获得同样的权益，其中俄国竟图将新疆、蒙古划入其势力范围。因此，保护我国在西藏的主权，抵制英国势力侵入西藏，避免列强的干涉和对我国领土的蚕食，成为当时对外交涉中的不易处理的难题。

面对严峻的现实，唐绍仪在印度同英使谈判中采取了清季外交史上罕见的强硬态度。他在会议桌上同英使费利夏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辩，唐绍仪严正表示：“此次来印度并非哀求议约，倘在印度不能妥商协议，我国自有办法，即本大臣奉命使英，亦自有办法。”^②唐绍仪在印度据理力争不达，宁愿中断谈判回国，亦不在没有明确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条约上签押。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和卓越胆识，迫使英国同意将谈判移到北京继续举行。为了达成协议，唐绍仪又采取在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地位的方法，使

① “拉萨条约”的内容，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347——348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② 程时敦：《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此处转引自李恩涵：《唐绍仪与晚清外交》，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第80页，1973年版。

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最后，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这个条约订明：“英国国家允不占西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①尽管条约规定西藏的电线、铁路、矿务等项利权有中英共享之意，但达到了保留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个主要的目的。这项对外交涉无疑是贯彻了尽量少损失权益的原则，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收回铁路主权方面，同样显示出唐绍仪的极力维护国家主权的这一特点。早在1900年唐绍仪任关内外铁路总办和1902年任津海关道时，他就通过谈判，顺利地收回了英国投资的关内外铁路（即现在京沈线），开始了我国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1906年，唐绍仪在沪宁、九广、沪杭甬三路交涉中，进一步扩大收回铁路主权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同英国签订合同的沪宁路，唐绍仪力争减少我国权益的损失，续借款由原来100万镑，减为65万镑，折扣亦由9折增至9.55折，行政管理机关则由华员2人、洋员3人的总管理处，改为设沪宁路局，由华总办一人主持，其他洋员均应秉承总办办理^②。还未正式签订合同的九广、沪杭甬路，唐绍仪则采取承认草约，并谋求在订定正式合同时扩大中国应有权益的做法。经过谈判，尽管未能满足绅商收回自办的要求，但九广路所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已确认主要职权由两广总督及总督委派之总办掌管。英人工程师及会计师只能起佐理作用，所

①前引王铁崖书，第345页。

②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篇》，第3080--3083页，1930年南京出版。

借款项由原定9折提高为9.4折，购料回佣改采一次支付若干酬金的方法^①。沪杭甬路则只借少量英款而由中国自行筑路^②。显而易见，这两路所订的合同，已使我国利权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二，在已订条约的束缚之下，或主权丧失已成事实下，唐绍仪则另辟途径，或者通过掌握实务，以便争取挽回部分权益。如果说，上述第一个特点，基本上是当时朝廷的国策及袁世凯的旨意，唐绍仪只是认真贯彻及稍有发挥而已。那么，第二个特点则主要是唐绍仪依据当时的客观环境而极力推行的一种救国方略。因此，可以预料，这种同国外既得利益集团相对抗的作法，依当时的国势和唐绍仪有限的地位、权力，其收效当然是微乎其微。

1907年唐绍仪在奉天巡抚任内拟定的，修建一条由新民屯经法库门、洮南到齐齐哈尔的大铁路的计划，集中体现了他上述的爱国思想和救国方略。

建造一条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以抵制日本势力在东三省扩张的构想，虽然在唐绍仪莅任奉抚以前就已提出，但一直只是“纸上谈兵”。唐绍仪则付之实施，并千方百计促其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毫无疑问，这项旨在挽回东三省权益的计划的推行，必然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唐绍仪仍然“一意孤行”。他一方面运用圆滑的外交手段同日本周旋，以分段修建、暂不宣布，延长关外铁路是为便利清国交通、与南满路毫不相干，

①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篇》第3080--3083页。

②同上书，第3661--3687页。

……等等办法和托辞来对付日本的“抗议”。另一方面则立即着手借款筑路，先是拟借美款，无法实现时改借英款。当英国受日本胁迫反而倒向日本一边以后，唐绍仪又转而向美国寻求援助，甚至不惜与美国合作引进美国资本开发东三省的资源。为了表示对抗日本的决心，唐绍仪联同东三省其他督抚声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宁愿集体辞职^①。稍后，唐绍仪在朝廷的安排下，专门为谋求实现这一对抗日本的计划而出使美国。后来，由于日本的从中破坏，并赶在唐绍仪之前建立了日美协定，才使这一联美制日计划陷于失败。

在京汉铁路的整顿以及逐步收回海关主权这两件事，也同样反映了唐绍仪的上述救国方略的构想。

当时已经全线完工的京汉铁路，赎回全路无疑是唐绍仪的奋斗目标，但这并不是短期内所能够实现的。于是，他通过对全路的整顿，以便逐步收回主权。由于该路不少员工过去只知敷衍洋人，以致路权旁落。唐绍仪撤换了一批高级的管理人员，又着重提高广大员工的认识 and 责任心，排除洋员对路权的操纵以及长期以来对该路管理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使华员逐步掌握该路的管理大权^②。

作为节制全国海关的税务会办大臣，唐绍仪对赫德控制海关大权、以致关务和人事均不能自主的状况十分不满。他一方面采用各种可能的办法，限制赫德权力的继续扩张，并以大臣的地位，镇慑赫德那种过份嚣张的声势。另一方面则采

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②《顺天时报》，1906年8月1日，26日，12月4日。

取实际可行的步骤，以期实现收回海关主权这个目的。在这些措施中，培养海关人才引起唐绍仪的特别注意。由于海关员工，尤其是一些重要部门的员工，历来均由洋人充当，即使收回海关主权，一时也无法由华人掌管海关事务。因此，唐绍仪提出设立专门学堂培养税务人才的主张^①，在唐绍仪的建议和推动下，税务学堂于1908年正式成立，并取得巨大成绩。民国以后几乎所有海关的华员，均出自该校，收回海关后，担负领导责任的就是这一批人员。

仅据上述，可见唐绍仪在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年代中，已为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作了不小的贡献。

二、顺应民主潮流的开国功臣

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1912年6月16日辞去国务总理这半年多的日子，是唐绍仪毕生经历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这段期间，无论从思想上或政治上来说，唐绍仪都是处于巅峰状态。

由封建皇朝的一品大员，转变为民国的建国功臣，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可以看作是一次罕见的飞跃。但是，只需略加考察，便会发现，唐绍仪的这一转变，决非偶然。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改变人们的思想，各个阶

^①《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叶元章：《抗战前的海关往事琐忆》，第11页，台北1987年版。此处转引自赵淑敏：《“税专”与中国海关的人事制度》（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海关研究首次国际研讨会论文）。

层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加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皇朝的瓦解指日可待。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既造就了一批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有识之士，也改造了许多长期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当时的这种环境，给唐绍仪的转变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唐绍仪少年留美，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正如他对伍廷芳所说：“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①归国从政以后，又培植了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并在政治实践中受到了锻炼。1909年的辞官，实在是他对满洲贵族操纵朝政的行径不满的表现，从而萌发了对朝廷进行彻底改革的设想。武昌起义及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使他认识到取消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已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于是，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大道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绍仪顺应潮流，在南北和谈中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所以，一些论者把唐绍仪同孙中山、黎元洪，称为民国肇始三大功臣。^②这无疑是对唐绍仪在南北和谈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过高的估价。但是，如果依据当时的实际状况作出客观评价，称之为中华民国开国功臣之一，唐绍仪应该是受之无愧。

说唐绍仪是开国功臣，需要包括他在南北和谈、出任总理、辞去总理三个方面为民国的建立和巩固所作出的贡献。

1911年的南北和谈，唐绍仪是作为袁世凯总理大臣的全权代表，同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之间进行的。双方的直

^①《辛亥革命》（八），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英人濮兰德所说，此处转引自李恩涵前引文，“集刊”第54页。

接会谈虽然只历时10多天，开过5次会议，即已确立了双方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定国体，优待退位后的清室等几件关键事项，实际上已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唐绍仪和伍廷芳之间面对面的会谈，已解决了建立民国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以后袁世凯和伍廷芳之间的会谈，只是为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出任总统铺平道路。

辛亥南北和谈之所以如此顺利，唐绍仪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所抱的积极态度乃是决定作用的因素。早在和谈伊始，唐绍仪“已剪辫、服常服”^①，对通过和谈实现民主共和充满信心^②，“敢决其必成”；对于南方所行的主义，“心以为然”，“有希望”^③。因而会谈开始后，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到，唐绍仪对伍廷芳的各项建议，几乎都采取接受的态度。尤其是关于“共和立宪”的讨论，唐绍仪不仅“无反对之意向”，并表示“今欲和平解决，非共和不可成，实有成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8日。

②《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9日载：“唐挟议和条件，闻有五：一、改大清为中华民国；二、黄帝纪元与清年号并用；三、改总理大臣为大宰相；四、地方行政长官由地方公举，由大宰相奏任；五、……。袁授意唐，除民主二字，无论何项，均可退步，闻唐初不赞成袁之君主立宪说，已辞职，袁坚挽之，唐遂向袁申说共说之利，闻唐行时，袁颇赞成共和。”同年12月16日《民立报》所载议和条款为22条，但未详列，同上述相较，多了设议院、选总统等。

③《辛亥革命》（八），第79页。

心”^①。

当然，应该看到，唐绍仪支持共和，是以举袁世凯为总统作为条件^②。但是，“拥袁共和”的方针，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及南北实力对比出发，恐亦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主张。因此，它得到立宪党人和包括黄兴在内的多数革命党人的赞同，我们无须因此而苟求于出自袁世凯门下的唐绍仪。况且，在和谈进程中，唐绍仪又竭力说服袁世凯和北洋将领，企希他们能够接受和谈达成的协议，以便实现共和。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第一、二次会议情况的电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唐绍仪说：“……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我不认共和，即不允许再行开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船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官兵数十员，声势愈大。……再四思维，维有吁请即日明降谕旨，命总理大臣颁布阁令，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征集意见，以定指归。……”^③此外，他又分别致电清军前线统帅、湖广总督段祺瑞和企图带兵反攻南京的张勋，劝他们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④。姑勿论唐绍仪的劝说能否产生效果，从后来因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不同而与袁世凯产生严重的分歧，从而导致唐绍仪被撤掉和谈全权代表，以及在临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21日。

②《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第123页，1946年版；《张謇传记》第181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③《辛亥革命》（八），第222—223页。

④《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2月5日。

时约法、迁都南京、袁世凯南下就职等问题上唐绍仪均支持南方的主张来看，在唐绍仪的心目中，“共和”较之“拥袁”似乎更重要。据当时的报纸报导，亦可证明这一点。

《香港华字日报》载：“闻唐决主共和，如袁不允，则唐与各员不回京。”^①唐绍仪在南北和谈中的功绩，完全应该加以肯定。

出任国务总理，并力图按照共和政体的要求去实施总理的职责，这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巩固和建设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绍仪就职之初，在向参议院阐述政见时，即展示他的远大理想。他据自己对中国积弱的根源的理解，着重提出要振兴外交实业。他说：“在满清时代与各国所订条约，名为和好，实则从未开诚公布，以致事事皆落人后，皆中国受亏”，所以必须改变对外交涉中的被动状况。又说：“从前社会趋势，专研究文字，而不研究实业，致以地大物博的中国，几变为世界最穷之国家，以致非借外债则不能办兴利之事”，“新政府成立后，即分设农林、工商二部，其宗旨即在振兴实业”^②。对于政府各部门的用人制度，尤其是负责人员的任用，唐绍仪提出：“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苟不至新人物无可搜求，或非旧人不能维持现状之事，决不可延用旧人。”^③唐绍仪的这些主张，充分表现了一个首任总理对建设民国政府的抱负。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26日。

②《民立报》，1912年4月2日。

③《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6月25日。

唐绍仪在总理任内，还力图摆脱袁世凯以总统身份直接插手政务的干扰，以求完全行使内阁总理应有的职责。从唐绍仪组阁开始，袁世凯即以太上皇的姿态干预内阁事务，所有人事安排、财政收支等等，他都亲自控制办理，企图置唐绍仪于傀儡的地位。在袁世凯的高压之下，唐绍仪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只要唐绍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也时常拒绝袁世凯的意旨而独立行事。例如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尽管袁世凯已表示同意，但因银行团提出了需垄断中国对外借款，“监督财政”等非常苛刻的条件，唐绍仪则严词拒绝，并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无受四国限制之理。”^①又如对比国借款的使用，唐绍仪完全自作自为，其中甚至有相当一部份钱用作接济南方的军费开支和购买新式武器，导致激起袁世凯和北洋派军人的愤怒，唐绍仪亦在所不顾。袁世凯为了笼络张勋，特拨餉银30万元，唐绍仪拒绝签署，只允发给3万元，……等等。唐绍仪的这些作法，无疑是开罪了袁世凯，破坏了他俩之间近30年的友谊，加剧了他同袁世凯和北洋军人之间的矛盾，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抹上阴影。但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以及国务总理的尊严，他却能断然处置，不能不说唐绍仪作为民国首任总理，在民国政府的建设中作出了贡献。

唐绍仪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的因素固然很多，其最基本的原因则是同袁世凯的矛盾已尖锐到无法调和的程度。因此，直接引起辞职的导火线乃是王芝祥的督直问题，唐绍仪拒绝在袁世凯独自委任王芝祥赴南京接收军队的命令上副署。

^①《民立报》，1912年3月26日。

早在唐绍仪南下组阁之时，南方领导人为了制约袁世凯，提出直督一职必须由同盟会员充任^①。于是授意直省议会，选举新加入同盟会的直隶省籍将领王芝祥为直督。唐绍仪当即以“尊重民意”为名，大力支持。“唐于袁前力赞其成，盖唐以王为南方重要人物，而又系直产，若使其督直，则南北意见必能调和，统一进行将以愈速。袁越其议，招王来京，并面诺直绅，俟王到京，即行委任。唐亦面允直绅，以此事必能办到。”^②

但是，当王芝祥抵京之时，袁世凯却暗中指使亲信军官，以“直隶五路军人”名义，通电反对王芝祥出任直督。

“袁便以军界反对为口实，委王赴南京去遣散军队。唐对于王的委任状，拒绝副署，说政府不宜以军队反对的缘故，失信于人民，”^③“事遂中辍。迨后参议员提出质问书，谓何故不遵照参议院议决之接收北方统治权办法，任命王为直督。总统府强辞曲解，拟具答稿，唐复拒副署”^④。但袁世凯竟将约法、总理置之度外，擅自把没有副署之委任状公布，并交王芝祥往南京赴任。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其一是直隶都督的位置对他来说

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辑，柏文蔚说提王芝祥任直督是唐绍仪的意见。

②《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

③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④《民立报》，1912年22日。

确是太重要了，决不能让一个同盟会的人将担任；①其二是所谓省议会，国务总理，参议员，他都不放在眼里，民国“约法”对他不存在约制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绍仪遂愤而辞职。为了表示决心，他还先“微行至津”，使去职既成事实。

唐绍仪辞职这件事的本身，绝不能看作是一件小事，或只认为是唐袁矛盾的必然结果。应该肯定，唐绍仪这种维护“约法”尊严和内阁权威的行为，对于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民立报》驻北京记者评论说：“唐总理之态度，实深景仰，……至以去就争之，尤见大臣风节。近来执政者一种心理，多以调停敷衍为长策，置信义于不顾。闻唐之风，亦可少愧。且唐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之点，为人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察，尤有绝大之关系，宪法未定以前，约法与宪法有同一之效力，而约法上国务员惟一之责任即在副署，……唐总理为保障约法上副署之权，出最后之决心以争之，使民国开幕之内阁，不致留贻汗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国人闻之，当如何欣慰！”②十多年以后，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对此事亦作了异常精辟的论述：“……而那些反同盟会派的参议员和新闻记者，不知此事关系的重要，因为平素不满意于唐的原故，对于唐的辞职出走，反加以嬉笑讽刺；就是同盟的议员，也只以王芝祥督直的目的不

①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37页。

②《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

能达到为恨，对于副署的责任问题，好象也并未十分注意。此种问题，莫说在英、法，就是在天皇大权的日本，假使天皇发下一道没有首相副署的敕任命来，日本的议会和新闻界，要发生一种什么喧嚣的状况？是不是“违宪”，“违宪”的声浪，要震动全国？但在中国当时，不过把它当一个通常内阁崩坏的问题罢了；除了对于继任的内阁人选，勾心斗角去经营，对于违宪的问题”竟好象“熟视无睹”^①。由此可见，唐绍仪辞去首任国务总理，亦是对中华民国的开国、对民国政府的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谋求共和统一的爱国人士

1913年至1928年间，中国政局极为纷乱，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先后控制着北京的中央政权，各地军阀蜂起，独霸一方，纷争不已。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虽然连续不断地进行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斗争，但一直到孙中山去世仍未见成效。直至1928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用军事压力和招安收编的手段，才勉强的、表面的统一了全国，建立起南京的国民政府，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但又招致了新的矛盾和抗争。

面对这样的客观形势，几乎所有的爱国有识之士，包括当时的革命分子，虽然纷纷提出各种救国方案，并为此而奔走呼吁，甚至流血牺牲，但都无法在短期内使国家的面貌获得改观。

^①李剑农：前引书，第163页。

在这漫长的17年间，除了由1917年夏至1921年初这几年以外，唐绍仪都没有担负任何政府职务，并且还数度返回家乡唐家湾“闲居”，表面上似乎脱离了政坛。但是，不论是在朝或在野，居沪或居粤，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政治舞台，关心着中华民国和广大民众的命运，救国之心从未稍息。唐绍仪在这十多年间或隐或现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反对帝制和独裁，进一步同北洋派决裂。

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的职务，实际上已是同袁世凯表示决裂。他在天津暂住期间，尽管袁世凯多次派人赴津挽留，甚至包括段祺瑞、梁士诒等在内的政府大员均亲往劝驾，唐绍仪都不为所动。为了表示决心，他断然将天津房产、古董均予拍卖^①，然后南下上海，随即返回家乡唐家湾小住。

1913年2月，粤省议会以最多票选举唐绍仪为参议员，袁世凯闻讯后“极为欣喜”，并手书令唐绍仪晋京担任参议院议长^②。唐绍仪再三恳辞参议员，还以“不复恋此马蹄声”来拒绝袁世凯的“慰勉”^③。1914年，唐绍仪在上海邀集一批绅商朋僚，开设“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以表面上从商来掩盖其对中国政坛的关注。唐绍仪拒不担负任何政府职务，并不是他自愿“隐居”，只能表明他同袁世凯的关系已达到绝对无法弥合的地步。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把自己推向全国人民的敌对地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7月9日、19日。

②同上报，1913年2月25日。

③同上报，1913年3月12日。

位。唐绍仪立即偕同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袁世凯，提出“严重警告”，并要袁“辞职以谢天下”。当袁世凯被迫发布取消帝制命令，但仍以大总统自居之时，唐绍仪再发出《忠告袁世凯退位电》，指责袁世凯“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①。唐绍仪反对帝制的坚定态度，受到当时正义人士的好评，所以“护国军”肇庆军务院成立时，曾特任唐绍仪为外交专使^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立即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唐绍仪接连三次电辞。后来，外交使团表示以唐绍仪是否出任外长作为是否提供借款的条件；社会舆论又纷纷批评唐绍仪不该置身于度外，视国家危难而不顾。在这样的诸多责难之下，唐绍仪不得不离沪北上，拟进京就任。甫抵天津，得悉张勋等北洋将领34人，签名反对唐绍仪出任外长。对于这种民初曾胁迫他下台的“督军干政”，唐绍仪甚为愤慨，断然再度辞职南返上海。这次事件，加深了唐绍仪对北洋派本质的认识，导致他此后同北洋派进一步决裂，并迅速站到北洋派的对立面。后来，他对安福国会、对徐世昌“当选”总统，均持批判态度，甚至1922年、1923年黎元洪先后两次任命唐绍仪组阁，他均坚辞或置之不理，迫使黎元洪分别以王宠惠、李根源署理了事。

唐绍仪同北洋派的对立，还集中表现在追随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下文另述）以及第二次南北和谈两个方面。

①原载《护国军记事》第3期，转引自《护国运动资料选编》（F）第638—639页。

②《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19日。

姑勿论对第二次南北和谈的评价如何，唐绍仪由第一次和谈时代表北方到第二次和谈时代表南方，这一戏剧性的转变，表明唐绍仪确已站到北洋派的对立面。在一年多的和谈过程中，唐绍仪始终坚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否认北洋军阀的御用工具安福国以及徐世昌的“当选”总统，要求恢复旧国会；要求北京政府废止中日军事协约及“二十一条”，裁撤日本扶植的参战军、国防军；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谴责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会谈的全过程，唐绍仪对北方的态度都十分强硬。和谈开始。唐绍仪即声明：必须解决陕西停战问题以及公布中日军事协约，否则停止和议。会谈中途，唐绍仪又一再坚持旧国会要完全行使职权，绝无折衷或讨价还价的余地，北方当然无法接受，终于导致和议破裂。后来北方改换和谈总代表以后，唐绍仪的态度依然甚为强硬，最后和谈以无结果而告终。唐绍仪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反对北方的非法与独裁，其积极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第二、有保留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

唐绍仪虽然是由封建皇朝的一品大臣转变而为同盟会会员，但民国以后他同孙中山的观点有许多一致或近似之处。除了如上所述的反对帝制、第二次南北和谈以外，对当时喧嚣一时的“参战”问题，约法问题，唐绍仪同孙中山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自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伊始，唐绍仪即以在野之身，表示支持并亲自参与。

1917年6、7月间，孙中山在沪策划联合西南各省进行护法运动，唐绍仪参加了商讨和酝酿。7月中，孙中山南下广州，8月唐绍仪乘坐参加护法舰队的军舰，抵达广州。9

月，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组成，唐绍仪被选为财政总长。但他目睹霸占着广东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桂系军阀对护法毫无诚意，而孙中山又只顾北伐而忽略军政府内部的巩固和团结，这样下去，护法事业难以取得成效。于是抵粤后旋即返回家乡唐家湾，静待局势发展，始终未就财政总长之职。11月，为了调和军政府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孙中山同桂系军阀间的矛盾，唐绍仪和伍廷芳、程璧光等在广州筹组“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孙中山对此曾表示同意。1919年1月，“联合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在桂系的操纵之下，“联合会”的性质同原议有很大的改变，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唐绍仪虽然被推为“联合会”的财政总代表，但他始终不予就任，后来“护法各省联合会条例”正式公布，他也没有签名。1918年2月，为了再度调和军政府内部矛盾，唐绍仪和伍廷芳、程璧光一起，邀请孙中山、莫荣新共同商讨改组军政府办法，但彼此意见分歧，毫无结果。自此，唐绍仪对西南护法已是心灰意冷，旋即离粤赴沪。1918年3月，以联合反段力量为名，东渡日本，直到同年11月才归国参加南北和谈。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时唐绍仪不在国内，但仍被推为七总裁之一。然而他和孙中山两人一直拒不就任，是年7月他还特从日本致电军政府辞谢^①。

1920年4月，唐绍仪支持孙中山的讨桂斗争，他俩与伍廷芳、唐继尧一起宣布脱离广州的军政府，在上海组织“四总裁办事处”。他们一再发表宣言，声明：“移设军政府，对北方继续言和，在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由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8年7月10日。

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接洽办理。”^①

1920年11月，粤军光复广州。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粤恢复军政府，唐绍仪被推为财政部长。由于同孙中山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唐绍仪虽然宣告就职，但实际上并未到任，不久便返回家乡唐家湾。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帅，任命唐绍仪为财政部总长。唐绍仪仍居家乡唐家湾，一直没有就职。唐绍仪自1917年夏参与孙中山的护法斗争，到这时实际上已告一段落，虽然名义上仍未脱离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已是分道扬镳。1923年夏，为了避免孙中山屡屡派人请他再度参政而离粤返回上海^②。

纵观这4年间唐绍仪的政治活动，非常明显，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采取有保留的支持态度。唐绍仪和孙中山的关系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若合若离的格局，乃是两人之间除了在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谋求国家统一，重建真正的中华民国等方面有着共同的观点以外，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分歧。概括地说，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是武力统一中国还是和平统一中国；是严格遵照法统法律抑或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在领导集团中是采独裁制还是采合议制。可以这样说，唐绍仪同孙中山有着共同的目标，但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却有极大的差异。究其实质，乃是唐主缓进、趋向保守，而孙中山则主急进、革命。

从民初纷争、反袁帝制开始，唐绍仪即反对使用武力，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第一次南北和谈的

^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503页。

^②《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7月3日。

成功，更加坚定他的这个信念。南下护法以后，他力主召集正式国会，依照法统，否定北方非法政府。在他看来，孙中山不问情况和条件，单纯依靠武力来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实不明智，也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因此，他既反对北洋政府的军人专政，也反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的武力北伐，甚至后来还反对军政府的存在。他曾说过：“吾人以护法为号召，则立言行事必以法律为根据，民国约法，主权在民，国会诸君民意所寄，窃以为与国会并立之机关，似不宜存。……军政府更无存在之必要”^①。

1920年驱赶了桂系，孙中山、唐绍仪等回粤以后，唐绍仪主张政务会议采合议制，不设主席总裁。但孙中山却提出立即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出兵北伐。这样，孙中山同唐绍仪的分歧便公开化和表面化了。唐绍仪认为，选举总统及出兵北伐的条件均不成熟；北方总统非法，南方决不能作出不足法定人数而选举总统之事^②。由于唐绍仪、伍廷芳、陈炯明、蒋介石等人均反对速选总统而又无效，唐绍仪便离穗返回唐家湾，不参与政事。后来，唐绍仪对前来劝驾的汪精卫说：“余于总统未选出前，认为行之过早，今既由国会以多数选出，余亦当然赞成，……至于财政总长一职，……余不愿担任”^③。此后，孙中山屡次派代表前往唐家湾劝唐出山，唐均不允，直至1923年夏离粤返沪。

对于孙唐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唐绍仪所持的保留态

①《香港华字日报》，1918年12月18日。

②长沙《大公报》，1921年1月21日，2月26日，4月16日。

③同上报，1921年4月29日。

度，我们不应对唐绍仪作过多的斥责或苛求。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分析，唐绍仪的主张有着合理的因素，与许多有识之士不谋而合。事实表明，选举总统和出兵北伐，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对当时的革命事业也没有发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反而促成了革命队伍的分裂，唯一的功绩是再一次表现了孙中山的勇往直前的不朽的革命精神。

尽管唐绍仪同孙中山在政见上有严重分歧，但唐绍仪对孙中山始终极为敬重。孙中山逝世后唐绍仪向《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民主运动之兴起，“要以中山之力为多”，“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之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唐绍仪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还认为：中山先生在从事民主运动中，“似近急躁”，以致未能获得成功，“十三年来所引起之错误与反动，亦不为少”，但“均不必记忆”。对于中山先生的逝世，“全国当表同情”^①。唐绍仪对孙中山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孙矛盾的症结所在。

第三、主张“联省自治”，谋求和平统一中国。

1920年，章炳麟、张继提出“联省自治”，湖南首先响应，稍后，四川、浙江、广东、江西、陕西等省纷纷附和。此后三、四年间，“联省自治”运动成了中国政坛一股有广

^①《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3月19日。另外，唐绍仪挽孙中山的对联说：“约法坏，民国危，革命未成功，谁能复支大厦；议和终，致位去，补天太无术，自愧有负使君。”由此亦可反映唐对孙中山的评价（见同一报4月8日）。

泛影响的潮流。当时所提倡的联省自治，本来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先实行省自治，各省自行制定省宪，在省宪的制约下逐步铲除地方军人势力；二是由各自治省派代表组成会议，制定联省宪法，设立联省政府，再扩大至全国，使中国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从理论上说，在当时军阀割据，以武力不易统一全国的情况下，“联省自治”不失为统一全国的一种方法。唐绍仪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赞成联省自治。孙中山也曾一度为了迎合联省自治的主张，提出组织联省政府^①。

唐绍仪认为，“中国区域之大，省份又多，……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②。他说：“省自治确为年来人民所共有的目的。其意在以政府权力置于人民手中，允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议会委派数人为内阁，执行政权，总统不过名义之首长，为对外之代表，所有事务，概经内阁之批准。如是则人民可直接参加于政府，不致受军人之管辖。国家即由联省而成”。“吾人之唯一计划，即在合各省而为联邦。……自治之真义，即在干涉军阀所存留之罪迹，注意日常发生之问题，而以国家之利益为重心。”唐绍仪还认为：“推翻军阀，不必由于革命，用人民坚定之志愿，以及和平合作之方

^①据长沙《大公报》载，1920年12月，孙中山派胡汉民等5人为委员，起草“联省政府”各项法制；1921年1月孙中山在军政府联席会议上公开表示支持“联省政府”，并加派法制起草委员；6月15日，孙中山发出“咸电”，提出于9月1日召开联省政府会议。应该指出的是，孙中山关于联省政府的主张，同“联省自治”有着很大的差异。

^②《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3月25日。

法，亦属已定。”^①显而易见，唐绍仪关于联省自治的主张，还是企图以“民治”、“省自治”的手段来束缚军阀从而推翻军阀统治，也就是以和平方法实现统一全国这个目的，其救国救民的意愿，实是良苦。但是，各地方军阀却都利用“联省自治”作为巩固地方割据、抗拒外来军阀入侵的挡箭牌，要他们服从民治、自治，最后使国家统一，这简直是与虎谋皮。所以说，如果孙中山以一省之武力进行北伐，意欲统一全国是不能实现的理想，那么，以联省自治、和平方法统一全国更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

此外，为谋求国家的统一与共和的重建，唐绍仪确是煞费苦心，提出过多种设想或方案。1922年，他曾主张过南北分立，在南方建立民治，以吸引北方的民众起来推倒武力专制；^②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他提出召开“息兵大会”，^③建立“良好而且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④1927年又提出：

“各方暂行息战，划地分治，各修内政”，“由元老主盟，各派一人，全权开会，议定统治地域，在若干时期内，各不相理，公等各修内政，视中外人心所向，即为天命所归。”^⑤

唐绍仪所以提出上述种种主张，都是由于他对民国以后中国政局的严重不满，对武人专政、军阀混战已达到深恶痛绝的程度，正如他自己所说：“自民元以来，武力起家资产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日。

②《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1月9日。

③同上报，1925年3月16日。

④同上报，1925年12月4日。

⑤《香港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

千万者，现几何人？壮丁健儿暴骨原野者几十万人，民间生命财产随以危亡者几十万家。回视国债，则千万兆，交通机关之破坏者又几百兆。……一炮之费，十家之产，此而曰民生主义，其生几何。吾侪固知苏俄赤化之可畏，而尤以全国混战为可哀。军兴时期，不必共产，而产已去其大半矣！不必公妻，而寡人之妻已多矣！……长此不止，民无孑遗。……”①由此可见，唐绍仪的救国之心，确是始终如一。但是，唐绍仪只是一个在野的元老，他的种种救国设想或方案，即使有许多合理因素，对于中国政坛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四、热心桑梓建设的政坛元老

1929年8月至1934年10月，唐绍仪重新担任政府职务，主政中山县。这5年间，他先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1931年3月起又兼任中山县县长。从作过内阁总理到当一个县的县长，这不仅是中国历代政坛所罕见，亦为时人所不易理解。孙中山早在1912年9月曾说过：胜任外长人选，“现时国际间之有资格者，首推唐绍仪，梁敦彦次之，陆征祥又次之。唐绍仪曾为过去总理，既无再任外交总长之理。……”②以孙中山当时这样的观点而言，唐绍仪担任中山县县长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有些回忆录说唐绍仪出任县长

①《香港华字日报》1927年6月27日。

②《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9月28日。

是贪图中山县这个“肥缺”，可以自捞一把^①，这未免是对唐绍仪的财产估计得太贫寒以及对他的品格贬得太低贱了^②。

考察唐绍仪生平的思想及其活动，不难看出，其在古稀之年，仍然不辞劳苦出任县官，主要是乡土情深，热心桑梓建设，希望在有生之年，为中山县更趋繁荣而尽力。

唐绍仪自1909年卸任朝廷职务回乡，至1929年重返中山任职的20年间，据当时报纸消息的不完全刊载，他返乡长住或短住的共有9次之多。逗留时间长则二、三载，短则二、三月。长期服官在外的显要人物，这么爱好乡居，在近代历史中实属少见，这只能用乡土情深予以解释。

唐绍仪于1909、1910年间在唐家湾建成宽敞豪华的“共乐园”，以后又一再扩建修葺，并亲自书写了“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的对联。1932年他还召集全村乡亲父老，当众宣告将“共乐园”送给乡民委员会，作为全村乡民的公园，并由所有亲属签押为凭。“共乐园”的修建到赠送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绍仪的乡土情深。

①郑砺石：《唐绍仪生平二三事》，《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第176页。

②唐绍仪说：1907年时中山一县的总收入是130万元。但据《顺天时报》载，唐绍仪因为兼职繁多，1906年的薪俸已达18万多两；又据《香港华字日报》载，1912年唐绍仪辞总理职南下，拍卖天津家具及物品，即值110万元，天津银行存票200多万元。由此推算，中山县1年的收入，只及唐绍仪在天津资财的1/3，而且，唐绍仪绝对不能将全县收入贪掉。故此，贪图中山的收入而当县长之说，似不能成立。

其实对于中山县的建设，唐绍仪早就甚表关切。还在1921年初，他和孙中山一起就有将香山建成“县自治的模范”之议^①，并亲自返回香山协助推行。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中山县定为全国的模范县，成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后，他即欣然担任委员会主席。他立即着手规划中山县的建设，对于中山港的开辟尤其重视，亲自赴京沪筹措建设经费、洽谈工程设计等事项。1931年兼任中山县长南归抵达香港时，他表示“今后惟有意诚心虚，以从事改进”，希望“风调雨顺，县泰民安”^②，充分体现其热心桑梓之情。在就职宣言中，唐绍仪提出：集思广益，人尽其才；发展实业，以利民生；地方自治，维护社会安宁；利归民众，款不虚糜；尊师爱生，加强职业教育等五项政要^③。在实际工作中，唐绍仪确能按此贯彻，并身体力行，事事躬亲。在他掌执县政的3年间，尽管客观困难很多，政坛派系斗争又极其复杂和不断，唐绍仪仍然取得显著的成绩。除中山港的建设因各种客观原因导致中途搁浅外，在实业、教育、文化、交通等各方面均有很大的发展，受到了时人的赞扬^④。

在这3年间，唐绍仪还参与了西南反蒋的活动。他是同南京对立的国民党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的成员，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宁粤合作”以后，他又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成员，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13日。

②《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10日。

③同上报。1931年3月18日。

④唐绍仪任中山县长时的成就，资料很多，此处不能一一列举。

军委会西南分会委员。但他只是以元老身份而又志同道合遂被邀参加，毫无实权，仅是参加或主持各种会议，发表宣言，除此以外，他都在中山主持县政。后来，连中山县长的职位也不稳，西南的实力人物陈济棠策动中山县部份士绅，发起倒唐。这种纷争延续了1年多，使他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下去，1934年获准辞职，于10月便离粤返沪。中山县的建设也就半途而废，但唐绍仪的热心桑梓之情，一直受到家乡后代的怀念与颂扬。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焦静宜

唐绍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跨越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清王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晚年滞留于已沦陷日伪之手的孤岛上海，最终死于非命。他浮沉于宦海政坛50余年，曾卷身于若干重大政治风暴与漩涡之中，加以海内外交游广泛，人际关系复杂，使他成为清末民初这个特定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涂抹了一层历史赋予他的特殊色彩。评价唐绍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是对一个具体人物的是非论定，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时代典型意义。

评价唐绍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注意到他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必需注意到他的复杂矛盾的人生历程，并着眼其一生中的主流大事，而不应纠缠在某些传闻的细微末节。

一

要准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不能离开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清楚，人物的准确评价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唐绍仪的主要活动正在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列强环伺的

复杂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指20世纪的头30多年。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由近代走向现代，由封建专制帝国走向民主共和国，社会发生剧变的过渡时期。辛亥革命的巨大震动标志着这种社会剧变，1912年3月5日的《时报》上曾以通俗谣谚概述了过渡时期的变化说：“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总统兴，皇帝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这些变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移风易俗的感觉。人们希望出现新面貌，于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行议会，建立民国，兴办实业；可惜古老的中国所背负的封建传统包袱过于沉重，封建土壤中培育的毒菌在侵袭蚕食新事物，于是新面貌成为一种扭曲的畸形；议会可以被军警干预和“团体”困扰，总统可以任凭军阀拨弄，责任内阁无法实行职权，军阀、政客、洋人、买办成为新兴企业的主人，政府财政乞灵于洋人掌握的关余、盐余；人们的心态唯“洋”是尚，于是“器必洋式”^①，宴客不用西餐“不足以示诚敬”^②，“外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③。但是，就在这种“洋化”过程中，若干旧制度旧风尚的残余继续存在，如民国军队中还有保存发辫的“辫子军”，民主共和国的禁域中尚有溥仪小朝廷依然奉行宣统正朔；三从四德、节妇烈女仍是作为嘉言懿行被提倡；复辟言论漫然流传并付之实行；四书五经与声光化电同时向莘莘学子灌输，使整个历史舞台呈现出一片诸色

① “谁维持国货”，见《大公报》1912年6月1日。

② “做上海人安得不穷”，见《申报》1912年8月9日。

③ “南京社会现形记”，见《时报》1912年3月18日。

杂陈、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而在这个舞台上晃动着一批形形色色的过渡性人物，既有逊国遗老，又有民国新贵。唐绍仪正是浮沉于过渡时期人海中的一员。这个崛起于下僚，洊升为清末尚侍、巡抚而荣登于中华民国首任总理的过渡人物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而是留下了可资借鉴、可作谈柄的雪泥鸿爪。认识这一历史背景，则这一历史人物的作为自能有所评价。

二

同样历史背景会有不同的历史人物，产生不同的历史作用，得到不同的历史评价，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个人的不同道路。唐绍仪有着充满错综复杂矛盾的人生历程，这些矛盾的交织使他对社会作了贡献，也使他落入灾难，功过是非，都可以追根溯源于这一点。

唐绍仪并非仕宦子弟，而是出身于有一定“洋味”的家庭。其父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其族叔唐廷枢当过怡和洋行买办，曾为李鸿章办“洋务”，任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总办，是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这样的出身要在封建统治集团中占据一席，甚至重要地位，确实需要冲破封建传统的重重障碍。

唐绍仪是中国早期派赴美国的留学生。1881年奉命回国入仕。这位比较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和思想并自承“素爱共和思想”^①的青年，必然和在传统封建文化土地上的生活现实

^①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见《辛亥革命》（八），第78页。

发生某些矛盾。

唐绍仪入仕后，一帆风顺地由下僚洊升为大员，先后内而尚书、侍郎，外而巡抚奉天，是封建官场中左右逢源的能员；而中华民国建立伊始即膺第一届内阁总理重任，实现责任内阁。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的对立矛盾也体现于唐绍仪一身。

唐绍仪入仕不久，就攀附上袁世凯，迅即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初期的重要智囊和“洋务”人员。从朝鲜，经山东到直隶，一直承担重任，为袁世凯所信任。袁世凯曾有多道专折肯定其才智：如：

（1）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十日《道员唐绍仪请调北洋片》称：“（唐绍仪）历在朝鲜、北洋供差多年，洞达洋情。到东后委办洋务、商务各局，均极得力。该道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尤为稳悉。”①

（2）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请将唐绍仪暂留北洋襄办交涉事宜折》称：“两年来，中外相安，无大枝节者，诎臣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实唐绍仪赞佐之力居多。……如唐绍仪者，才识卓越，志趣正大，而谙练交涉，冠绝辈流，将来东方结局，应付极难，留备擘画，实亦必不可少之才。”②

正由于袁世凯对唐绍仪这种非同寻常的器重，所以辛亥革命中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任命为北方总代表。当时，唐绍仪一方面为袁世凯心膂，深知袁拥有实力，非袁不能承担

①《袁世凯奏议》（下）。第38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②《袁世凯奏议》（下），第1015页。

统一重任，而实心实意为袁谋求一生中命运所系的大事；另一方面，由于接受了与孙中山类似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因而思想上倾向共和民主，尽心竭力维护南方利益。其结果，必然为顽固拥袁者所媒孽而不能安其位。他虽然博得了南方革命方面的赞赏，但又始终不为国民党实力派所信托。唐绍仪始终处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之中，虽多面周章而时有见肘之厄。

唐绍仪个人的经历就是在上述诸多矛盾之中，从而熔铸了他的复杂性格。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是有助于评定唐绍仪其人其事的。

三

了解历史人物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性格后，就应从这一人物一生中选择主流，着眼大事而有所论定，至于细微末节似可从略，所谓“小疵不掩大醇”。综观唐绍仪一生行事，可称“有所建树，大节未失”。

唐绍仪一生政治生涯中有4件大事可作为主流而予以评论：

（一）竭力实行维护民族利益的外交

唐绍仪以办外交起家，并以折冲交涉的才干而蜚声海内外。他从1881年回国后即任天津税务衙门供职，旋赴朝鲜办理海关及通商事宜，成为袁世凯得力伙伴和助手，使袁对他有“忠直明敏，胆识兼优”^①的好评。甲午战争以后，在朝

^①《中日韩史料》1629号。

处境益难，唐绍仪艰苦支撑，出任华民总商董及总领事以抵制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展。1901年，唐绍仪被袁世凯调任津海关道后，担任了北洋外交重任，协助袁世凯在津推行新政。1904年，他奉命与英谈判西藏问题，历尽曲折，推翻非法的《拉萨条约》，力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06年所订新约，虽尚有未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为日后处理西藏问题留下了有力依据。1906年任会办税务大臣时，特成立税务处以节制华洋海关人员，极大地削弱洋人权利。这一措施使长期霸占海关实权的赫德不得不承认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的强人^①，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日，折衷各方关系，表现了外交上的主动精神。辛亥革命后，唐绍仪反对再签新的不平等条约，主张不损害权利的自由借款。从唐绍仪外交生涯中选择的这几件荦荦大者的行动，都证明唐绍仪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曾经为维护民族利益的不屈不挠的奋斗。唐绍仪一生最大的历史成绩应该说是外交活动的成就。

（二）倾向共和，坚持资产阶级民主

唐绍仪以辛亥革命为其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绍仪以与袁世凯长期隶属关系和拥袁统一的主张而被委以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但由于他在与民党接触中受到一定影响，加之其本身所接受过的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因此他逐渐倾向共和，并改而主张南北联合实行共和立宪。

^①汪敬虞：《唐廷枢研究》附录，转引自吴晓迪：《略论清末民初的唐绍仪》（油印本）。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有意夸大南方实力，采取妥协、促成的态度，并积极倡议召开国民会议等等。由于他倾向南方的共和立场比较明确，以致引起顽固守旧分子的嫉视，攻讦他“先自赞成共和，其电一味恫吓，竟全堕彼党之计中，实不称议和之任”^①，“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②。袁世凯为了便于窃取更大权利，对唐绍仪虽采取了不信任态度，迫使唐离去议和总代表的职任，不过仍保持某些信息往来，使唐绍仪在幕后发挥其促成和议的作用。

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必须选择一个南北各方都通得过的人物充当首届总理以安定局面。唐绍仪适当其选，因为袁世凯一直以唐为心腹，认为纵然有某些不一致处，但终不致背叛自己，加以接近南方的言行正好被利用来维系甚至欺骗民党人士。但是唐绍仪并不能按照袁世凯所想象的模式去任职，而是真正地推行民主制度，实行责任内阁，因此，在1912年3月25日唐就任后与袁发生争执时，曾表示“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③，明确地表示不是忠于一姓的封建观念，而是忠于国家的民主观念。民初政局虽然有财政艰窘、党派纷争等种种困难，但是唐绍仪都能力任艰巨，而惟独不能侵犯民主政

①《“毓善等致电袁世凯”》，见《辛亥革命》（八），第156页。

②尚秉和：《北京政府成立》，见《辛亥革命》（八），548页。

③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84页。

治。他一直坚持责任内阁，袁世凯始而指使段祺瑞、赵秉钧等破坏内阁会议，继而以不经总理副署而直接改变王芝祥督直的委令，终于明目张胆地破坏责任内阁制，迫使唐绍仪于6月16日去职。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以不足百日的短命而遭扼杀。唐绍仪为维护民主政治，不顾数十年私谊，毅然与袁世凯决裂，从拥袁走向反袁，脱离北洋集团，归向反袁势力，表现了“政治家纯洁高尚之风度”^①。唐去职以后，虽名为赴沪经商，实则密切瞩目政坛风云。1916年，袁世凯称帝，唐绍仪与蔡元培、汪兆铭联名电袁反对。蔡、汪的反对在袁意中，对唐，则使袁以数十年袍泽旧僚不致“绝情”如此感到难堪。护国军兴，唐又正式发出《忠告袁世凯退位电》，义正词严，警告袁莫与举国人心为敌。唐之反袁与陈宦之反袁同为致袁于惊恐颓然以至自毙的文武两棒。这些行动，证明唐绍仪已开始从封建营垒走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道路。唐绍仪不仅反袁称帝，在1917年反段破坏约法的护法运动中也参加了南方护法军政府；1919年，唐又接受军政府委任，参与另一次南北和谈，虽然在议和中唐的调和态度已远远不能与辛亥议和时之有历史价值，但在会谈中表示的反对安福国会、反对二十一条，不承认山东问题和支持学生运动等主张仍然维护了孙中山的护法旗帜。1920年，唐绍仪应孙中山之命参加讨伐桂系军阀二次护法运动，反对窃取权利的岑春煊等，支持孙中山，基本上仍是站在民主共和立场上，为护法运动作出贡献，是值得给以肯定的。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302页。

（三）卓著成绩的中山建设

1929年4月到1934年10月，唐绍仪出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后又任该县县长。这种由一品大员屈就七品县令的行动，在历史上是罕见，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惊人之举。所以当时群情揣测，说法不一，其中有唐之出任为图利之说，但从唐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已有的政治、社会地位看，似不符合唐的动机。分析当时形势，可能有这样几点：一是唐自辛亥以来一直钦佩孙中山，20年代以后，孙的转变虽使唐感到有距离，但基本上是拥孙的。建设孙中山的故乡，既为表达自己与孙的密切关系，又可顺应社会上对孙的崇敬心情，争取有利自己的舆情；二是唐与国民党中胡汉民、汪精卫及西南势力比较接近而疏远蒋介石。30年代前后正是蒋介石积极翦除异己的年代，唐绍仪明哲保身，韬晦曲全，借“建设中山”这个大题目，有意躲避高层政治漩涡而求为县令；三是唐主要还想为乡里做些实事，这是一般显宦都愿做的事，在桑梓父老间留下口碑。实际上，唐绍仪在中山建设中提出开辟港口与兴建港区的种种设想与措施，至今令人感到具有相当生命力。

唐绍仪以中山建设方略为凭借，提出开辟中山港作为“南方巨大良港”，以取代香港、广州的地位。港口建于唐家湾前后环沿海地区，可停泊5000至2万吨位的轮船，并制订了《中山港建设大纲》，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赞助。这一设想如果得到实现，则将产生军事与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可惜由于唐的去职而未果。

唐绍仪还十分注重港区的建设，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

兴办实业，对外开放，发展贸易，开设渔市场；二是市政建设，铺设水泥马路，修建下水工程，建设水塔，改善港区生活条件；三是交通设施，修建公路、码头、机场，方便交往，开拓运输渠道；四是文化教育事业，兴建医院、运动场，将个人经营多年的私人花园改建为共乐园，供群众作游乐憩息之所。拟定《二十年度教育计划》，增拨经费，建立学校，培养技术人才。这些建设，有的实现，有的只是设想，但至少是尽了主观努力，在当时内战纷扰、列强虎视的情况下，确是地方建设中卓著成绩的一例。

（四）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唐绍仪一生的功过是非，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评论和争议，但这些只是孰多孰少，孰大孰小的量的不同；而晚节如何，则将影响于唐绍仪的质的定性。这是唐绍仪一生中的大节所系，出入之间，有毫厘千里之差。唐绍仪是1938年9月底在上海寓所被杀害。由于其知名度高，以致引起海内外的震惊，对其死因，群情揣测，莫衷一是，而流传较广的则为因其与日伪间关系暧昧而被军统所杀一说。这一事实真相如何？唐绍仪究否罪有应得？是有关论定的重大关键。

唐绍仪是社会经历复杂的人物，故旧属吏遍布海内。抗战发生后，他由香港还居孤岛上海，自然地成为各方猎取的对象，特别是日本已经入侵，妄图以华制华，唐绍仪的声望势必受到重视，于是时有往还。根据档案记录，发现日本从1938年1月开始制定拉拢唐绍仪、吴佩孚充当傀儡的“南唐北吴”计划，尤其对唐更有具体步骤，即：“经唐绍仪关系，拉拢戴季陶、居正、吴稚晖、何应钦、张群、吴鼎昌、

刘湘、龙云及桂系财政巨头，使唐组织全国政府，取蒋地位而代之”^①。并由日本外务省顾问船津、驻华大使谷正之、侵华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本、老牌特务土肥原及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井等，与维新政府汉奸陈中孚、任援道及温宗尧等频繁接触，会商唐绍仪出山问题^②。当然，唐绍仪是有丰富政治阅历的人物，对于政治代价了如指掌，他要对各方形势加以分析和估量，绝不会轻易就范，靦颜事敌，甘当汉奸的。他需要权衡得失利害，所以有举棋不定的情况。国民党政政府一方面以唐绍仪这样一位名满中外的人物如公开投敌而颜面难看，影响极坏；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政府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日后或许要借唐的复杂关系与日本进行幕后交易，所以不能容许唐绍仪成为明牌汉奸，由孔祥熙通过唐的亲属故旧游说笼络，不仅许以官位，还馈赠财货并劝其离沪去港，这又使唐不能不对自己的出处有所考虑。

从现已掌握的资料看，唐绍仪与日伪蒋均有所接触这一点，似乎已无疑义。唐绍仪个人态度也确乎暧昧不明。但其至死没有袍笏登场，没有正式投敌，成为汉奸，那就不能以未实现的行为定其罪名，也不能即据以认定其晚节有亏。事实上，所谓汉奸之说只是传闻之辞，并无任何政治势力加以文字论定。而国民党政政府在其死后尚明令褒奖，拨付丧葬费并宣付史馆立传，如唐已失节，作为当时正式的中国政府决不敢如此。不过，唐绍仪与日伪确有接触谋划，态度又犹豫

①第82号情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政政府财政部驻沪特务（化名南湖）曾有致孔令侃密电多件报告唐的行踪。

动摇，因此也不能称其为“保存晚节”，但可以论定为“晚节未失”。既然如此，唐绍仪决不能背负“汉奸”罪名而被杀。至其被杀，据现有档案证明确为军统人员所为。近来《中外杂志》载军统原北平站长的回忆认为唐已定意作汉奸，故予处决。此说难以置信；一则个人回忆并无文字依据，充其量属于孤证；二则，其目的为论证杀唐的正确性；三则似为针对沈醉“误杀论”而发”^①。至于军统为何杀唐，缺乏正式可靠的直接资料而难以说明。据当时形势推测，唐与日伪接触日益密切，将有损于蒋介石的切身利益；又因唐蒋之间有宿怨，如唐实现投敌，则蒋将处于尴尬地位。排除异己，杀鸡警猴，蒋可收一箭双雕之效。据此，我认为错杀之说是符合实际，因为军统杀唐，是将未正式投敌出任伪职的唐绍仪，按汉奸罪名而加以错杀的。

四

总之，唐绍仪是20世纪头30多年这个重大变动的过渡时期中的有典型意义的过渡人物。他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可訾议的地方，如挪用路款、任用亲信、奢侈靡费、贪图名利。但其大节未失，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从而应在中国近代史上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①沈文发表于《共鸣》杂志1987年3—4期。